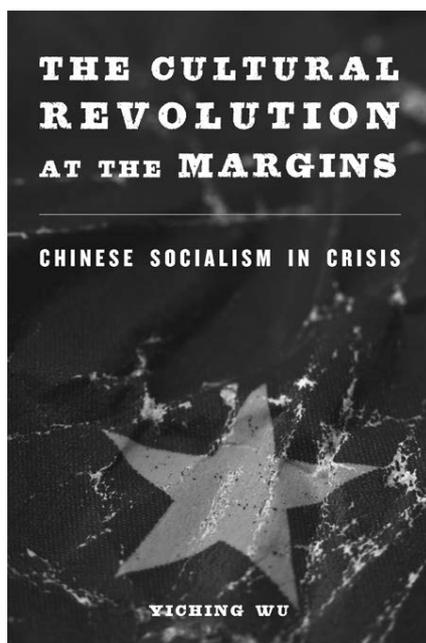


社會主義中國的危機與轉型

——評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 宋國慶、董國強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上世紀90年代蘇東巨變後，作為世界上仍然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其發展道路愈來愈受到國

際學界關注。及至本世紀初，更有學者提出所謂「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為中國的發展道路背書^①。2004年，兩位左翼經濟學家哈特—蘭茲博格 (Martin Hart-Landsberg) 和柏克特 (Paul Burkett) 在美國馬克思主義門戶期刊《每月評論》 (*Monthly Review*) 發表長文〈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與階級鬥爭〉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以下簡稱〈中國與社會主義〉)^②，對所謂「中國模式」——即市場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激烈批評，引發西方左翼學界有關中國發展道路的爭論。隨後，其他左翼刊物也相繼跟進，圍繞中國社會主義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性質和走向、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源和動力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

總的來講，西方左翼學者以及中國「新左派」對所謂「中國模式」的批評對於我們認識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一些新的社會問題有積極意義。然而，在如何處理文革前社會

西方左翼學者以及中國「新左派」對所謂「中國模式」的批評對於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有積極意義。然而，在如何處理文革前社會主義實踐和文革後資本主義市場化改革的關係上，他們的觀點值得商榷。

要深入探討市場化改革的利弊得失，離不開對文革歷史的重新認識。吳一慶《邊緣》一書嘗試建構一個集歷史研究和現實批判於一體的解釋框架，探討文革期間產生的處於政治與意識形態邊緣地位的民間激進思潮。

主義實踐和文革後資本主義市場化改革的關係上，他們的觀點顯然值得商榷。例如他們認為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取得的經濟成績，不僅得益於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經濟基礎，也在於毛時代人民所受到的教育和鍛煉。此外，他們還特別強調革命遺產在社會變革轉型中的特殊作用^③。以斯維齊(Paul M. Sweezy)、馬格多夫(Harry Magdoff)、韓丁(William Hinton)、哈特-蘭茲博格為代表的一批左翼學者，更是從肯定毛時代社會主義實踐的立場出發，認為中國目前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完全顛覆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革的結果就是私有代替公有，直至徹底地陷入資本主義復辟和日益強大的外國資本勢力的經濟控制之中^④。必須指出的是，此類讚賞「前三十年」、批判「後三十年」的觀點，並非只是一小部分西方毛派學者的獨創，而是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近二十餘年來中國和西方左翼學界的普遍看法。

在上述歷史背景下，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吳一慶於2005年發表〈從階級關係反思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一文，對〈中國與社會主義〉一文以及認同該文觀點的西方左翼學界和中國新左派提出了批評與質疑。吳文的重要論點包括^⑤：

首先，深入嚴謹的階級分析不應只停留在市場化所帶來的負面階級後果，而應進一步研討市場化的階級動因。其次，「市場社會主義」或「市場化改革」必須放在更具體的社會歷史脈絡中去研究和看待。第三，社會主義如果缺乏實質性的、有效的大眾民主參與，這有可能帶來致命的歷史和政治後果。最重要

的是第四點，其實這也是第三點的必然推論，即一個更廣闊的歷史批判視野不僅是可能的，亦是非常必要的：我們要同時批判資本和國家、資本積累和官僚權力，以及兩者之間結構和歷史的聯繫。

這顯然是主張從一種更為宏觀的歷史視角出發，突破關於「兩個三十年」的固有認知，探究改革開放前後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關聯性。

要深入探討市場化改革的利弊得失，離不開對毛時代中國歷史，尤其是文革歷史的重新認識。以上述文章為基礎，2014年吳一慶完成專著《邊緣的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主義的危機》(*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以下簡稱《邊緣》，引用只註頁碼)，嘗試建構一個集歷史研究和現實批判於一體的解釋框架。該書出版後，獲得美國社會科學歷史學會(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的最佳學術著作獎，值得文革研究學者關注。本文將首先對該書的研究視角以及主要內容作一簡要介紹，然後對其主要體思想及主要觀點進行點評，最後揭示其現實意義。

一 社會史視角

自1966年文革運動爆發以來，經過幾十年的持續積累，相關研究成果可謂異常豐富，精彩紛呈。這些研究成果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較為傳統的精英政治研究，其關注重點是中共高層內部分歧的由來與發展，以及由此所引發的政

治衝突和階段性的主要矛盾變化；另一類是社會史視野下的群眾運動研究，其關注重點是一般社會公眾在文革運動中的反應和抉擇，以及群眾運動對地方政治發展、經濟建設、社會生活和人際關係的實際影響^⑥。《邊緣》一書探討的主要內容，是文革期間產生的處於政治與意識形態邊緣地位的民間激進思潮，如遇羅克等人對「血統論」的批判、上海「一月革命」期間的「經濟主義歪風」、湖南造反派組織「省無聯」的激進思潮等。因此，該書在研究路徑上無疑應該歸於第二類。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邊緣》的研究路徑仍是社會史視野下的群眾運動，而且書中的幾個案例都有學者做過專門研究，但該書在新材料的發掘應用以及對這些案例的解讀上，顯然有別於先前的著述，寫作目的也大相逕庭。作者申明，該書「從難於駕馭的邊緣視角出發，目的在於更好地理解 and 恢復為正史不載以及在現有學術成果中未被充分研究的政治和思想發展的可能性」（頁xvi）。該書通過重新解讀三個典型案例，構成一個從民間激進思潮的視角來分析文革的整體性理論框架。而且，作者把文革運動和後文革時期的社會轉型聯繫起來加以考察，始終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切身感受與利益訴求，也使得相關歷史敘述浸染了濃重的人文關懷。

二 全書主要內容

《邊緣》全書由六章和一個「結束語」構成。在第一章「無法想像的革命」中，作者反思了一種社會影響十分廣泛的既有文革史敘事範

式。文革結束之後，一些知識份子認為文革堪比德國的納粹運動，是一場極端瘋狂和毫無理性的浩劫。這一歷史悲劇的唯一後果，是「文化及精神價值的喪失，地位和榮譽的喪失，事業和尊嚴的喪失，時間的喪失，真理的喪失，生命的喪失，簡而言之，幾乎任何賦予生命以意義的東西的喪失」（頁2）。自1980年代初開始，中共領導層為了掩蓋文革這一極端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所暴露出的許多嚴重政治問題，也刻意附和或利用這種簡單的去歷史化和去政治化的悲情敘事。因而，關於文革的集體記憶便只剩下「野蠻」、「暴力」、「痛苦」，以及對野蠻、暴力行為的道義譴責。作者認為這種過於簡單化的歷史敘事不僅無助於理解歷史真實的多面性和複雜性，而且極易導致對文革後市場化改革的溢美。

事實上，隨着近年來中國社會矛盾的不斷出現與貧富分化程度的愈益加深，上述文革敘事範式已經受到挑戰。然而，要真正打破既有的文革敘事範式並不容易。作者認為實現上述目標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徹底摒棄去歷史化和去政治化傾向，把文革期間發生的許多真實故事置於特定的歷史和政治背景中加以考察和敘述，使文革運動變得可以理解和易於感知。他還特別強調，要充分意識到文革歷史的複雜性和多元性，必須通過重新分析和評價那些看似邊緣的、反映社會底層民眾訴求的思想和行動，以期重新認識和闡釋文革運動及其政治遺產。在作者看來，許多民眾積極投身文革運動，不僅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同時也是他們對自身所處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一種反

《邊緣》通過重新解讀三個典型案例，構成一個從民間激進思潮的視角來分析文革的整體性理論框架。作者把文革運動和後文革時期的社會轉型聯繫起來加以考察，始終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切身感受與利益訴求。

由於毛澤東的晚年思想不連貫、模糊、碎片化和自相矛盾，其「繼續革命」主張與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貌合神離。毛的「繼續革命」理論基礎薄弱，無法觸動中共官僚體制的根基。

應。他們的所作所為，折射出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困境以及由此引發的政治對抗。由此可見，在看似瘋狂的外表之下，文革運動其實蘊含着相當的理性成份（頁11-12）。

第二章「來自過去的敵人：官僚制、階級以及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用上相當篇幅詳細論述了毛時代中共幹部隊伍日益顯現的官僚化和特權化趨勢^⑦。1949年後中共官僚制度不斷強化，不僅在中共黨政幹部隊伍內部形成了顯著的等級差異，同時也疏遠了黨員幹部與普通民眾之間的關係。海外很多文革研究者基於上述事實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社會主義異化理論，認為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是因為他對官僚特權階層深惡痛絕，希望藉此整頓革命隊伍。換言之，他們認為文革運動真實地體現了毛「繼續革命」的主張^⑧。

作者通過系統考察文革前的階級成份制度，大力修正了這一「繼續革命」的觀點。他特別指出，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著中基於唯物史觀的階級劃分標準和階級分析範式不同，1949年後中國大陸盛行的階級成份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政治控制的考量（頁39）。因而，所謂「階級」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被刻意地模糊起來，以便隨時迎合最高當局的現實功利主義需要——例如「黑四類」可任意擴展為「黑五類」乃至「黑七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出現的「腐化墮落份子」和文革期間出現的「走資派」、「叛徒」、「特務」、「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新生的資產階級份子」等莫名其妙的概念，都是上述模糊認知和政治策略的邏輯發展。

作者還指出，由於毛澤東的晚年思想不連貫、模糊、碎片化和自相矛盾，其「繼續革命」主張也與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貌合神離。按照文革期間的主流輿論宣傳，之所以要打倒「走資派」，是因為他們代表了「過去的敵人」如地主、富農、資本家等的利益（頁48-49）。這種通過與1949年以前「階級敵人」的關聯性來論證當下政治清洗合法性的策略路徑，使得文革運動完全喪失了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所蘊含的現實批判性內容。由此可見，毛的「繼續革命」不僅理論基礎十分薄弱，而且注定無法觸動1949年以後形成的中共官僚體制的根基。

第三、四、五章是本書的主體部分，主要討論突破官方禁限的激進思潮和政治活動。第三章「從血統到造反有理：北京紅衛兵運動中的階級和公民權政治」聚焦於1966年夏秋那場社會影響十分廣泛的「血統論」爭論。當時，一批中共官員子弟出於維護等級制度和自身特權的目的，公然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歧視和打壓家庭出身不好的社會群體子弟。這理所當然地引發了其他社會階層的強烈不滿。青年工人遇羅克等人挺身而出，對「血統論」提出了系統的批判。他借用當時的主流政治話語，強調判定一個人政治態度和社會地位的唯一標尺，應該是其行為表現而非家庭出身。他抨擊「血統論」實際上為等級制度和特權階級的存在提供了一件合法外衣。他還利用其本人家庭出身（「黑七類」）和階級成份（工人）的悖論，指出「血統論」其實無法自圓其說。在解讀與評價遇羅克

的這些思想時，一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往往特別強調其人文主義的一面^⑨，而作者則強調提倡人權並非遇羅克思想的全部意義。遇羅克的思想遺產在於他把批判特權階級和強調平等與公民權相結合，從而在對「血統論」的批判中形成了一種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特分析與批判路徑（頁93）。

第四章「革命煉金術：經濟主義和上海一月革命」重新探討了1967年初上海「一月革命」的過程及其意義。作者從所謂「經濟主義」問題（其實是長期受到歧視的臨時工、合同工、知青等社會群體為維護自身權益而提出的正當要求）入手，利用已有和新發現的歷史資料重新還原了「一月革命」的複雜過程。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認為，「一月革命」是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領導上海工人造反派實施的一次成功奪權^⑩。而作者則認為，「一月革命」的爆發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事先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奪權計劃，而且毛、張、姚所扮演的角色也並非如既有敘述認定的那樣突出。他指出「一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地各種政治勢力在瞬息萬變的政治形勢下頻繁互動的結果，這一過程充滿了「突破與抑制，造反與秩序，革命與重建等〔力量〕的糾纏」（頁139）。

作者認為，上海奪權事件的重要意義在於，毛及其追隨者迅速克服了原先文革理念中顯而易見的不協調性和不連貫性，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較為連貫的運動指導思想，即通過發動群眾「造反」、「奪權」，顛覆原有的官僚政治秩序，再通過中央主導的「大聯合」實現「由大亂

走向大治」的目標。從全國範圍看，上海「一月革命」引發的奪權浪潮導致各地黨政機構的垮台，但取而代之的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治的實現，而是由軍隊主導的恢復政治控制權的努力。在這一過程中，反映底層民眾利益訴求的「經濟主義歪風」遭到當局的漠視和批判，在造反運動中形成的各類群眾組織統統遭到遣散。由此可見，「一月革命」不是文革進一步激進化的標誌，而是預示了一度合法的群眾性造反運動的終結和變相的官僚政治體制的復活。

第五章「革命死了，革命萬歲：湖南文革運動的民間激進化」聚焦於1967年秋成立的湖南激進造反派組織「省無聯」（湖南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⑪，詳細敘述了該組織的形成過程，並對「省無聯」核心成員楊曦光（楊小凱）等人的思想遺產作出新的闡釋。已有的一些研究論著在談到「省無聯」時，要麼強調其政治主張的思想史意義，要麼強調「社會衝突」在其興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⑫。本書作者依據大量第一手資料，對上述觀點提出商榷。他強調與1966年下半年較為典型的「造反派」與「保守派」的派性衝突不同，1967年10月成立的「省無聯」是各派群眾組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分化、組合的產物。而導致各派群眾組織分化、組合的關鍵因素，是1967年1月至9月間中央和地方當局消解群眾運動、恢復政治秩序的種種舉措，以及由此引發的新的政治利益衝突。

儘管作者承認「省無聯」確實為文革前利益受損的群體提供了表

作者認為「一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地各種政治勢力在瞬息萬變的政治形勢下頻繁互動的結果。它不是文革進一步激進化的標誌，而是預示了一度合法的群眾性造反運動的終結和變相的官僚政治體制的復活。

「省無聯」不顧毛澤東的「大聯合」號召，公然抵制中央及地方當局恢復秩序的努力，並借用文革初期盛極一時的激進主義話語，較為系統地闡釋了自己關於「社會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獨特理解。

達不滿的機會（頁188），但他同時指出，「省無聯」及其政治主張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他們全然不顧毛澤東的「大聯合」號召，公然抵制中央及地方當局恢復秩序的努力（頁14），並借用文革初期盛極一時的激進主義話語，較為系統地闡釋了自己關於「社會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獨特理解，較為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訴求。他們在〈我們的綱領〉及〈中國向何處去？〉等重要文獻裏反覆強調，文革的目標應該是打倒紅色資本家階級，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權（頁181）。由於上述激進主張突破了最高當局為文革群眾運動設定的軌範，因此極有可能導致群眾運動進一步激進化。正是出於對這種潛在危機的憂慮，中央和地方當局才迅速對「省無聯」進行了鎮壓。

第六章「文革後的危機應對：中國後社會主義的歷史根源」試圖在前面三章實證研究的基礎之上，從一個較為宏觀的視角，系統回溯1966至1968年中國底層社會思潮逐步激進化的過程及其動因。作者注意到這一過程中毛澤東自身角色的內在矛盾性：一方面，毛作為文革運動的始作俑者，一度熱情支持學生、工人和其他社會階層的造反行動；另一方面，作為中共官僚階層的最高代表，一旦群眾性的造反運動有可能危及官僚階層整體利益和黨國一體的政治體制時，他便採取斷然措施終結群眾性的造反運動（頁193）。事實上，文革運動爆發不到半年，毛便通過建立「革命委員會」謀求重建地方黨政權威，逐步回歸集權統治的常態；只是由於一些始料未及的政治插曲，在全國

範圍普遍設立革委會的努力直到1968年夏秋才最終實現。

然而，文革初期主流輿論大肆鼓吹「大民主」猶如打開了潘多拉盒子，而1968年春「大聯合」以後對群眾運動持續不斷的無情鎮壓，又造成社會底層民眾與中共統治階層的日益疏離，因而由中共主導的秩序重建工作很難收到預期成效，各種與主流意識形態相互抵牾的民間異端思潮層出不窮。特別是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以後，這些異端思潮竟然由地下走向半公開，並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從文革中期的知青地下讀書會，到文革後期的「李一哲大字報」，再到後文革時期的「西單民主牆事件」，其內在的緊密關聯和發展脈絡顯而易見。這給當局帶來了持續性危機，並成為舊官僚上台後不得不正視的重要問題。最後，中共不得不在1970年代末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借用市場化手段改善經濟民生。這一方面使得中共政權的政治合法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維繫，另一方面也使得其固有的僵化意識形態面臨各種新情況、新問題的持續挑戰。

在「結束語」中，作者試圖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下探討「兩個三十年」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作者認為中共領導的旨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那場革命，並未真正在中國全面實現社會平等的政治目標（頁228）。因而，毛澤東於1966年發動了一場「繼續革命」，試圖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解決特權階層和黨政機構官僚化的問題。然而，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著中那些具有批判意義的階級理論以及與之相關的政

治實踐，在中國語境下被嚴重地庸俗化了，晚期毛主義（「繼續革命」理論）沒有充分意識到1949年後的階級結構與社會衝突，所以毛發動的文革從根本上來說是失敗的。

作者認為，文革運動中真正具有革命意義的思想主張實際上產生於一批年輕的造反派當中，他們渴望依照巴黎公社的原則，推翻官僚資產階級，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但這些思想主張未及實施，群眾性的造反運動便遭到鎮壓。毛澤東在鎮壓他釋放出來的社會造反力量的過程中，耗盡了所有的政治能量，也喪失了改革社會主義的機會。毛時代結束後，中共領導層迫於種種現實壓力，開始自上而下推進市場化改革。然而，由於政治改革方面無所作為，公共權力得不到應有的制約，結果衍生出所謂「權貴資本主義」，引發強烈的社會不滿，最後導致1989年的大規模社會抗議運動。

縱觀「兩個三十年」的歷史，作者認為我們應該從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汲取經驗教訓，「沒有實質性的民主機制和積極的大眾參與的社會主義，不僅在道義上說不通，而且也是難以實行的」（頁237）。他還指出，社會主義理論曾為受壓迫、受剝削的勞苦大眾抵抗資本主義提供了系統而有力的思想批判武器和政治倫理典範。然而，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道路並不平坦，迄今為止，在那些自我標榜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實際情況往往是執政黨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利益集團，以「社會主義」之名全面壟斷了經濟、政治和其他社會資源，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不過是執政黨的輿論

宣傳虛構出來的一個政治神話。而在其後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借助國家權力和鐵血手段所積累起來的巨大社會財富，又名正言順地轉化為少數特權階層「資本主義復辟」的原始積累。這就不難理解「為甚麼在短短二十年的時間裏，一個看起來似乎能促進社會主義革新的改革過程，到頭來卻導致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⑬。

三 幾點評論

要對《邊緣》一書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我們必須先對三種文革敘事的歷史發展進行簡單的梳理。

第一，「繼續革命說」。這種歷史敘事源自文革期間中國主流媒體的輿論宣傳，其實是毛澤東個人對其發動文革的一個解釋。這種歷史敘事從特定的政治立場和政治需要出發，不惜大肆掩蓋和歪曲許多重要事實，因而毫無真實性和學理性可言。而且，由於文革運動的實際發展往往與毛的主觀設想相去甚遠，必然導致這種歷史敘事在邏輯上破綻百出，很難自圓其說，其輿論宣傳的功能在文革中後期也日趨式微；本書和其他相關論著中關於文革期間異端思潮的記述已經有力地論證了這一點^⑭。不過，由於長期以來中國輿論封閉，非主流的聲音遭到禁限，所以這種歷史敘事對許多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和外國人依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第二，「權力鬥爭說」。這種歷史敘事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文革運動的一些本質內容，使得人們對文革乃至毛時代中國政治的認知有所

文革運動中真正具有革命意義的思想主張產生於一批年輕的造反派當中，他們渴望依照巴黎公社的原則，推翻官僚資產階級，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但這些思想主張未及實施，群眾性的造反運動便遭到鎮壓。

深化。但由於這種歷史敘事主要關注高層政治鬥爭，而對波瀾壯闊、盛極一時的群眾性社會運動的動因、過程和性質少有涉及，因而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而且，由於嚴重缺乏許多至關重要的歷史文獻，這種歷史敘事對很多關鍵問題的解釋往往帶有主觀猜測的性質^⑮，如「楊、余、傅事件」和「林彪事件」。還有一些著作，在實在無法解釋的情況下，以空洞抽象的人性論分析代替了具體詳實的實證研究，因而大大消滅了這種歷史敘事的學理性^⑯。

第三，「社會衝突論」。這種歷史敘事誕生於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時，李鴻永、駱思典(Stanley Rosen)等一批西方學者將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引入到文革研究，關注重點是群眾性的造反運動和派性鬥爭。他們認為：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後，相當一部分社會群體成員因為家庭出身、政治表現等因素受到歧視和壓制，因而當毛澤東發出文革號召以後，他們迅速成為造反派，與保守派(在文革前舊體制下受益的社會群體)及其所捍衛的既有政治秩序進行殊死鬥爭，從而導致文革期間嚴重的派性衝突^⑰。受此啟發，上世紀80年代起，王希哲、楊曦光、劉國凱、鄭義等一些親歷文革的造反派紅衛兵也相繼提出「兩個文革說」。他們認為：文革運動其實包含了兩個本質極為不同的事物，其一是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其二是底層民眾反抗中共政權的鬥爭。以往許多相關論著都強調毛為了達到清洗政敵的目的，操縱利用了群眾運動，其本質是「運動群眾」。「兩個

文革說」則提出，造反派為了給自己的反抗行動披上一件合法外衣，事實上也反過來利用了毛以及文革期間盛極一時的激進意識形態話語^⑱。

筆者認為，第三種歷史敘事以前所未有的批判性思維和學理性洞見，揭示了文革前中國社會中存在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徹底打破了長期以來借助輿論宣傳所構建的關於「革命」和「平等」的政治神話，大大增進了我們對於文革乃至毛時代中國政治的理性認知。不過，這種歷史敘事在充分展示文革前「十七年」中國社會階級分化和利益衝突的同時，沒有意識到中共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的模糊性和搖擺性所造成的嚴重政治後果。徐友漁、卜偉華、李遜、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和董國強等人近年來陸續推出的一系列研究論著，指出1967年「一月革命」以後的群眾派性衝突與1966年下半年的群眾派性衝突，在根源、屬性和表現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異^⑲。也就是說，1967年以後的派性衝突不是文革前社會利益衝突的產物，而是文革期間中央政策左右搖擺以及由此引發的複雜政治互動的結果。董國強還曾明確指出，「兩個文革說」的偏誤在於「過份強調了群眾性『造反』運動的主觀自覺性，過於強調了人們對現行體制的不滿和反抗的勇氣……它忽略了在所有社會資源被權力獨佔性壟斷的情況下，一般社會公眾必然產生的人身依附意識和嚴重的犬儒主義傾向」^⑳。

《邊緣》在整體上屬於上述第三種文革敘事，其最初靈感和基本觀點都源自「社會衝突論」。作者

「社會衝突論」這種歷史敘事在充分展示文革前「十七年」中國社會階級分化和利益衝突的同時，沒有意識到中共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的模糊性和搖擺性所造成的嚴重政治後果。

在書中引述了楊奎松等人關於毛時代中共幹部隊伍內部等級制度的細緻分析，使得「社會衝突論」的實證詮釋被推進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頁26-27）。而且，由於本書重點敘述的三個典型案例都涉及後來遭到當局嚴厲鎮壓的極端激進少數派組織（尤其是楊曦光所在的湖南「省無聯」），所以作者的觀點深受「兩個文革說」的影響也不足為奇。從作者對這些案例的細緻描述和分析來看，「兩個文革說」似乎也不全然是空穴來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具體論述三個案例的實證部分，作者似乎始終對學界現有的各種解釋體系都保持着高度警惕，不願見到任何先在的主觀預設干擾其對研究對象的客觀考察和獨立判斷。因而，書中的很多觀點和結論實際上已經溢出了「社會衝突論」的軌範，甚至包含對該理論的批評和質疑。

但是，當作者試圖在較為宏觀的層面上對毛時代和後毛時代中國進行連貫考察和理論闡釋時，他的核心觀點實際上發生了漂移。在該書「結束語」部分大段大段關於「社會主義」概念及其歷史實踐的分析論述中，「社會衝突論」或對其批評質疑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作者甚至斷言毛時代的中國是一個「世界上最貧困但最平等」的社會（頁235）。這樣，本書的實證研究部分和理論闡釋部分便顯得相互脫節，甚至存在着一些明顯的自相矛盾。

本書另外一點值得商榷的地方，是對毛澤東及其政治主張的分析。儘管作者在書中許多地方一再強調，毛晚年的政治主張和政治行為是模糊、碎片化和自相矛盾的，但是由於作者的相關論述大多局

限於「革命」和「繼續革命」，「階級」和「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和「後社會主義」，「黨國體制」、「資本主義」等理論概念分析（這其實正是他所批評的去歷史化和去政治化的表現之一），所以讀者很難對毛政治思想的基本底色和內在邏輯形成一個清晰的印象。另一方面，從前言開頭「猴王」和「小猴子」的比喻（頁xv-xvi），到第二章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對黃炎培的談話（頁18），再到書中其他地方多次提到毛對中共執政以後出現的特權現象和官僚化傾向的深惡痛絕（頁19-21、29-30、193-94、236），作者似乎又在有意或無意地向讀者灌輸着一種觀念——毛是社會底層民眾利益訴求的突出代表，其政治主張帶有顯著的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或民粹主義）傾向。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作者在書中的不同部分對毛及其政治主張做出怎樣不同的闡釋和評價，他所依據的主要仍是老一代西方學者數十年前的研究著述——這些看法常常使人聯想到前面提到的第一種文革歷史敘事。事實上，隨着文革以後毛早年和晚年大量文稿和講話的公開披露，以及眾多領袖人物傳記、年譜資料的大量出版，我們現在完全有條件對毛的思想傾向和政治主張作出新的歸納和闡釋。

我們冒昧地在此提出兩點看法：第一，老一代西方學者關於毛澤東晚年思想的解讀和闡釋，大大高估了毛的馬列主義理論素養，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在西方歷史文化語境中形成的知識譜系和思想主張的一種主觀投射，與歷史真實相去甚遠。毛二十五歲前一直生活在中國

《邊緣》的最初靈感和基本觀點都源自「社會衝突論」。但在該書「結束語」部分，「社會衝突論」或對其批評質疑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作者甚至斷言毛時代的中國是一個「世界上最貧困但最平等」的社會。

無論作者在書中的不同部分對毛及其政治主張做出怎樣不同的闡釋和評價，他所依據的主要仍是老一代西方學者數十年前的研究著述。但老一代西方學者關於毛澤東晚年思想的解讀和闡釋，大大高估了毛的馬列主義理論素養。

內陸省份湖南，其正規學歷僅限於湖南省立師範（相當於高中）。從《毛澤東早期文稿》等歷史文獻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的政治理念深深植根於中國政治傳統，其核心內容包括儒家的「修、齊、治、平」道德說教和法家的「法、術、勢」政治技巧。他確實通過楊昌濟接觸到一些德國古典哲學著作，但他對這些哲學著作的理解和共鳴主要源自中國傳統的「心學」。1920年代初期投身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後，毛由一個青年學生轉化為一個職業革命家，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去仔細研讀各種理論經典。他在延安時期的確讀過一些馬列主義著作，但這種閱讀帶有明顯的「急用先學」、「活學活用」、「立竿見影」性質。雖然在毛澤東其後的文稿和講話中，經常會出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術語，但毛對它們的理解和運用往往與其原有內涵相去甚遠。在很多情況下，它們在毛的話語體系中不過是「好的」與「壞的」之分類標籤。所以按照馬列主義理論框架去理解和闡釋毛的文革理念，無異於緣木求魚、刻舟求劍。

第二，以中國傳統精英主義政治觀念（儒家和法家在這一點上高度一致）為思想底色的毛澤東，絕不可能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在毛的話語體系中，「民主」概念的本質內涵是「開明專制」，其最高境界是說錯話可以免於處罰，但「錯」與「不錯」，完全出自毛個人決斷；罰與不罰，完全看毛當時的好惡。一些西方學者認為1957年鳴放一反右運動和1967年文革運動的逆轉，是毛受到黨內官僚勢力的壓迫不得

已而為之，一方面誤解了毛的個人政治傾向，另一方面忽視了中共奉行的政治原則。中共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是「一把手」負責制，黨的最高領導人始終擁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權威，黨的組織原則和黨內道德倫理都必須服從與服務於這一基本原則。也正因為全黨上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廣泛共識，中共才能作為一個整體在對敵鬥爭中無堅不摧、所向披靡。

本書第二章提到，1957年鳴放運動逆轉的標誌是6月8日《人民日報》的文章和同一天毛澤東的談話（頁33）。事實上，毛澤東在5月15日發出黨內通信〈事情正在起變化〉才是扭轉乾坤的關鍵。從大力鼓吹鳴放到突然發動反右，毛的葉公好龍心態和任意而為性格暴露無遺。談到文革運動的逆轉，我們很難想像在1966年底已經喪失權力的「走資派」，有何力量可以迫使毛澤東在1967年改變初衷。一個得到廣泛認同的合理解釋是，毛之所以要發動文革，是因為大躍進失敗在黨內引發了嚴重的政治分歧。毛為了重塑個人形象和鞏固個人權威，希望借助群眾運動清洗少數持不同政見者。而為了賦予這種政治清洗某種合法性，他還和一幫御用文人發明了一套「反修防修」的意識形態說辭。然而，群眾一經發動，局面便愈趨失控。依然出於維護個人權威的需要，毛很快決定動用軍隊武力終結群眾運動。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做法，與1957年的故事如出一轍。至於在中共官僚階層和底層社會民眾之間，毛更靠近哪一邊，我們只要看

看大饑荒期間毛對各地死人報告的態度，看看文革期間「大聯合」時「群眾代表」的象徵性地位，以及「大聯合」以後對「群眾代表」的大肆清洗，答案不言自明。

以上關於毛澤東及其晚年思想的辨析，無意對毛作誅心之論，而是試圖闡明兩個簡單的道理：第一，一個人的政治理念，與他生長的時代、社會經歷和知識譜系緊密相關；第二，要深入了解和準確把握一個政治人物的思想傾向和政治主張，我們不但要聽其言，而且要觀其行。許多西方學者顯然沒有充分意識到上述問題。而本書作者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他們的看法，不免使本書的立論基礎受到影響。

四 結語

綜上所述，《邊緣》一書在對文革運動的理論闡釋方面存在着一些明顯的悖論。但書中關於文革期間社會底層激進思潮的實證研究，以及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狀況的客觀描述，依然應該得到充分肯定。作者有力地指出，作為中共官僚階級的最高代表，毛澤東不能也不敢真正打倒整個官僚階級和現行政治體制，所以他的「繼續革命」充其量只是改良主義性質的改革（頁236）。作者還指出，文革結束後重新上台的官僚階層，無意通過政治改革重新激活已經奄奄一息的社會主義，而是選擇了市場化改革這一政治策略（頁221-22）。其消極後果是，近三十年來官僚權貴階層獨佔資源的問題愈來愈嚴重，權力

與資本的勾結致使社會弱勢群體的權益受到侵害，社會分化日益明顯，社會矛盾日趨激化。這就使得文革期間出現的反官僚、反特權的激進思想主張在現實社會中找到了合適的土壤。

顯而易見，中國要想真正實現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政治目標，就必須適時推進政治改革，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進一步協調官民利益，有效阻止市場社會主義發展成寡頭、權貴資本主義。我們十分認同作者的上述看法。目前中國領導人似乎對其所面臨的危機已經有所認識，也採取了一些干預措施。至於當局對危機的認識究竟有多深刻，其干預措施究竟能否收到實際成效，我們將拭目以待。

《邊緣》一書在對文革運動的理論闡釋方面存在着一些明顯的悖論。但書中關於文革期間社會底層激進思潮的實證研究，以及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狀況的客觀描述，應該得到充分肯定。

註釋

① Joshua C.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②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56, no. 3 (2004): 8-123. 該著於2005年出版，參見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5)。中文版參見哈特-蘭茲博格 (Martin Hart-Landsberg)、柏克特 (Paul Burkett)：〈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與階級鬥爭〉(2006)，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a-and-

socialism/marxist.org-chinese-ChinaandSocialism-index.htm。

③ 參見 Samir Amin, "On China: 'Market Socialism', A Stage in the Long Socialist Transition or Shortcut to Capitalism?", *Social Scientist* 32, no. 11/12 (2004): 3-20; "China, Market Socialism, and U.S. Hegemony", *Review* (Binghamton, NY: Fernand Braudel Center) 28, no. 3 (2005): 259-79; 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讀書》，2007年第6期，頁3-13。

④ Paul M.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Harry Magdoff and John B. Foster, "China and Socialism: Editors' Foreword", *Monthly Review* 56, no. 3 (2004): 2-6; 哈特－蘭茲、博格、柏克特：〈中國與社會主義〉，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a-and-socialism/marxist.org-chinese-ChinaandSocialism-introduction.htm。

⑤⑬ 參見吳一慶著，關晨引譯：〈從階級關係反思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批判與再造》（復刊版），第21期（2005年7月），<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05/08/10/%e7%ac%ac%e4%ba%8c%e5%8d%81%e4%b8%80%e6%9c%9f%ef%bc%9a%e5%be%9e%e9%9a%8e%e7%b4%9a%e9%97%9c%e4%bf%82%e5%8f%8d%e6%80%9d%e4%b8%ad%e5%9c%8b%e7%9a%84%e3%80%8c%e8%b3%87%e6%9c%ac%e4%b8%bb%e7%be%a9%e5%be%a9/>。

⑥⑳ 董國強：〈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2期，頁65-74；74。

㉑ 數據顯示，新中國成立之初黨政幹部僅300萬，到1965年激增到1,160萬，文革初期短暫

下降，1969年降至920萬，但從1971年開始，黨政幹部再次猛增，1973年達到1,700萬。參見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208-209。

㉒ John K.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9)。

㉓ 如陳奎德：〈中國自由主義在文革中萌芽〉，載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頁608-10；張育仁、張夷弛：〈遇羅克的殉難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粵海風》，2009年第5期，頁69-75。

㉔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arry Harding, "The Chinese State in Crisi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7-217。

㉕ 有學者認為之所以用「湖南省會」而非「湖南省」來命名該組織，是為了防止中央對跨地區的全省性組織產生忌諱。但實際上，所謂以「省會」冠名的造反派組織，其組織仍然具有跨地區

性。參見陳益南：〈文革中湖南「省無聯」問題概述——文革史研究之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5095。

⑫ 此類著述包括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Berkeley, C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9); Jonathan Unger,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no. 1 (1991): 3-37;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rfare at Beijing's Universities", *The China Journal*, no. 64 (July 2010): 202; Yin Hongbia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ndencies of Factions in the Red Guard Move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5, no. 13 (1996): 269-81。

⑬ 詳見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⑭ 此類著作包括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3; Gao Wenqian,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A Biography*, trans. Peter Rand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⑮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

⑯ 這種解釋體系最重要的早期論述來自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5)。

⑰ 參見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載《王希哲論文集》（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81），頁87-141；楊曦光：《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8）；劉國凱：《人民文革論》（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鄭義：〈兩個「文化大革命」芻議〉（2006年5月19日），獨立中文筆會網，<http://50.22.162.226:602/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517>。

⑱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董國強：〈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頁65-74；〈派性身份、個人處境與政治抉擇：從地方視角反思文化大革命〉，《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4年6月號，頁44-54。

宋國慶 德國弗萊堡大學漢學系
博士研究生

董國強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